

与民更始，除旧布新

——中国历史上的特赦

■本报记者 王剑

在9月3日胜利日阅兵之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追溯历史，大赦与特赦自古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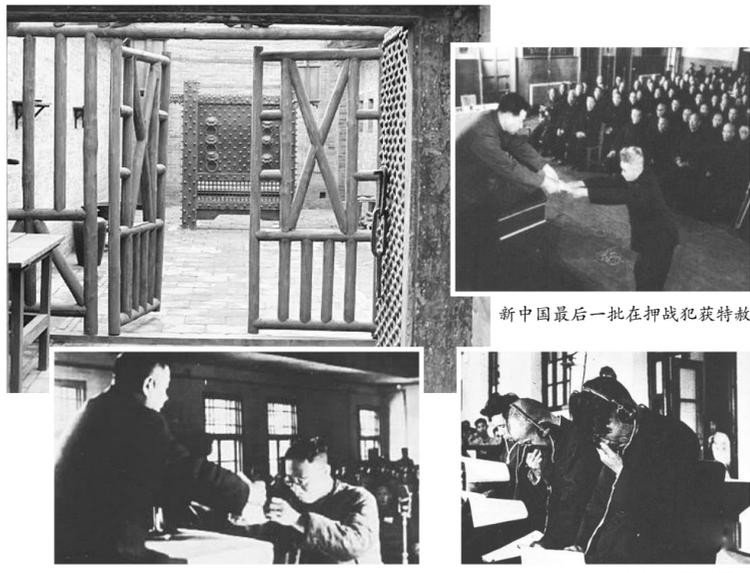
历史上大赦和特赦的重要节点

中国历史上，经常会有皇帝“大赦天下”的举措。有人统计，我国两千多年来，皇帝实行的赦免多达1200余次，各个朝代平均每两三年就会有一次大赦。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东林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赦”是赦免制度中的一种。赦免既有对特定对象免除刑罚的特赦，还有对一切罪犯免除刑罚的“大赦”。

王东林告诉记者，中国特赦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舜统治时期。传说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五刑”。尧舜为先王仁圣之君，认为五刑过重，不符合以仁德治天下的思想，于是进行改革，给犯罪应当接受相应刑罚的人佩上一种“标志”，以象征对他的惩罚，称为“象刑”。象刑对罪犯是终身适用的，心理压力巨大，执行效果也不好，难以实现打击犯罪、教化百姓的目的。于是皋陶不得不处死了一些罪犯，实施死刑。但改为实刑，皋陶必首当其冲，受死罪。舜非常聪明，特意选在纪念尧逝世一周年时，宣布废除死刑，采用实刑；同时以纪念尧帝去世一周年日为理由，大赦天下，对所有罪犯免于处罚，救了皋陶一命。

王东林坦言，大赦和特赦主要是追求文化和政治上的意义。清末学者沈家本对汉代大赦进行了分析梳理，归纳出大赦实行的20多种节点：一是即皇帝即位，有“与民更始”“除旧布新”的意味；二是皇帝改换年号；三是册封和皇家人生礼仪大事；四是祭祀大典，如郊祀、祀明堂、封禅、立庙等；五是军国大事，包括军戎大典，如从军、克捷、巡狩以及徙官、定都之事；六是文教活动；七是农业生产之典礼；八是对天地象界的应对，如祥瑞、灾异之属；九是国家遭遇突变，如遇乱，即遭遇战乱，需要全国动员，消除矛盾，凝聚人心。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特赦通知书

特赦日本战犯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汉以后历朝之大赦，特赦，大致如此。

哪些罪不可赦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十恶不赦”，王东林表示，中国古代的“十恶不赦”确有实在在规定的十种不可饶恕的罪名。西汉在“大逆不道不敬”罪条基础上发展出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规定凡犯此十罪，既不能赎，也不能赦免。隋唐以后，“十恶不赦”的罪名被确立并稳固下来。一为“谋反”，列十恶之首，指企图推翻朝廷政权；二为“谋大逆”，指毁坏皇室宗庙、陵墓和宫殿；三为“谋叛”，指背叛朝廷，投靠敌国；四为“恶逆”，指虐待和谋杀祖父母和父母、伯叔等尊长；五为“不道”，指杀一无辜人家三口以上和杀人肢解犯罪；六为“大不敬”，指冒犯皇室尊严，偷盗皇帝祭祀器具和皇用品，伪造御用药品等；七为“不孝”，指不孝顺祖

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八为“不睦”，即谋杀亲属，或女子殴打、控告丈夫等；九为“不义”，指官吏之间自相杀害、士兵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等；十为“内乱”，即亲属之间通奸或强奸等乱伦犯罪。

由以上罪名可以看出，古代的大赦或特赦是有原则和底线的，如果所犯之罪直接危害到封建王朝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侵蚀到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权力和国家最高利益，是不在赦免之列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次特赦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实行过8次特赦。王东林介绍，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家对经过一定时间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被特赦的战犯中，有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

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特赦后的杜聿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接着在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几乎连续对上述战犯以及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赦免的主要标准和前提条件为“确实已改恶从善”，第七次为无条件赦免战犯。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爆发。短短23秒钟时间内，唐山被夷为平地，城市功能全部瘫痪，约60万人被埋在废墟下。大救援随即展开，解放军战士和唐山人民，硬是用双手，扒出和救活了30多万人。当时唐山监狱关押着300多名犯人。幸存下来的200多名在押犯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救援队，在震后二十四小时内奋力抢险，共救出112人，事后全部归队，无一入逃。国家对其中40多名表现突出的在押犯人给予了特赦。

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特赦

“特赦不是中国的特例，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有特赦制度。”王东林告诉记者，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都有所谓特赦法规。美国总统根据联邦《宪法》规定，有权赦免“弹劾案件以外”的所有罪犯。

法国总统也有权进行特赦，国家《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都有详细规定。

德国的赦免制度分“大赦”和“赦免”两种。大赦指依法免除具有一般要素的大量案件；赦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特赦，主要是免除或减轻个别生效刑事判决的法律后果等。

意大利的特赦，仅限于免除主刑的全部或部分刑罚，但不包括附加刑。

日本有所谓“恩赦”，是经由天皇认证、内阁执行的赦免制度。据日本《恩赦法》，共有大赦、特赦、减刑、刑罚执行的免除和复权五类。

就在今年年初的时间点上，韩国政府为庆祝韩国光复70周年，对6527名罪犯实行了特赦。这是朴槿惠总统执政以来，韩国政府的第二次特赦，这也是韩国第六次大规模赦免。这次特赦同样设立了底线，划定了范围，赦免对象以“生计型”犯罪为主，也就是为生活所迫的犯罪对象。赦免这些人能够得到国民的认同。但是，凡属于腐败、暴力、危害国民安全的罪犯均不在赦免之列。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日本投降仪式背后的故事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日本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国民政府于次日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1946年起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就是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由来。但9月2日当天发生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故事，知道的的人并不多。

起初，美国总统杜鲁门把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的光荣任务交给了身为陆军将领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军，没想到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兼中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不乐意了，因为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空战，美国海军出力最多，于是尼米兹公开表示将不会出席投降仪式。最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考虑了海军的意见，决定在美国海军军舰上举行投降仪式，以示对海军功劳的肯定，由麦克阿瑟作为同盟国代表，尼米兹作为美国代表签字。之所以选择“密苏里”号作为受降仪式地点，是因为这艘战列舰不仅是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更是用杜鲁门总统的老家密苏里州命名的。

在举行签字仪式时，麦克阿瑟使用了5支精致的派克笔，分别签下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盟军最高统帅，以及年月日。其中第一支和第二支笔当场就送到了陪同他签字的温赖特中将和英军珀西瓦尔中将，第三支笔送给美国政府，第四支送给了母校西点军校，第五支则送给了妻子琼妮。

温赖特中将和珀西瓦尔中将分别是麦克阿瑟有意选定的两位陪同者，分别是原驻

菲律宾美军司令和原驻新加坡英军司令。1942年，二人对日战败被俘，被日军关在奉天(沈阳)战俘集中营整整三年，备受折磨，此时已身体瘦弱，面容憔悴。麦克阿瑟身后还分别站着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受降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排在最左侧。

当天，中华民国政府派出六名代表出席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由徐永昌上将领队，另5名成员是杨宣诚中将、朱世明中将、王之少将、李树正上校、王丕承上校。徐永昌上将紧随美国之后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排在九个战胜国中的第二位。徐永昌本是晋绥军主要将领，但深得蒋介石信任，加上为人低调，因此能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受降仪式。但他却丝毫没有胜利的喜悦。9月3日，中国代表团准备在东京设宴畅饮，徐永昌极力劝止，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尽人情者。”

在签字仪式现场，所有美军官兵，都穿着最随意的衬衫式军便服。美军规定，出席投降签字仪式的士兵全部着军便服，以此表示对日本的蔑视。当天见证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美国士兵、记者、摄影摄像师挤满了密苏里号，坐的坐，站的站，还有的攀爬栏杆，看上去非常随意。

日本方面由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军方出席。重光葵穿上了正式的燕尾服，而以梅津为首的7名军官所穿军礼服则皱皱巴巴，脚上的靴子也无光泽。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担任过日本驻中国公使、总领事，参加受降仪式时拄着手杖，因为他断了一条腿。他的腿是在1932年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被朝鲜抗日志士尹奉吉投掷炸弹炸断。

签字仪式结束后，几百架美国飞机排成整齐的阵式飞越军舰上空。当年《大公报》记者黎秀石这样写道：“由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的大型空中编队，从‘密苏里’号上空呼啸而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和平的曙光在世界东方升起！”

(吕小羽根据百度百科及相关历史资料编写)

科学史话

不为人知的布莱切利园

二战初期，纳粹德国对欧洲国家实施闪电战，攻势凌厉。至1940年，英国在德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节节败退。然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并不气馁，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布莱切利园。

布莱切利园是二战时英国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GC&CS)的代名词。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建于1919年，总部原设在伦敦，其前身是一战期间隶属于英国海军部的解码机构，由于设在海军部大楼的第40号房间，得来“40号房间”的代称。一战结束后，“40号房间”与军事情报机构合并，成立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于1939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前几间迁至布莱切利园。

破译恩尼格玛机

布莱切利园最为人所知的“功绩”，就是它曾经成功破解了德国传说“不可破解”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密码系统。二战爆发前夕，波兰密码局曾向英国情报部门披露有关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破解技术，而英国政府就是凭借这些情报开展解读恩尼格玛密码机讯号的行动。

战时布莱切利园的解密工作一般都是由数学家和解密专家进行。其中，后世最为人所熟悉的专家要算是艾伦·图灵。当时的电子计算机尚未问世，但是科学家对它的工作方式已展开了先行性理论研究。战后研制第一代计算机的过程中，图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布莱切利园庄园内第一次认识恩尼格玛机并了解了波兰“炸弹”机的细节。

波兰“炸弹”机能阅读有五轮置换的三密钥轮“恩尼格玛”机无线电报，但德国人后来又启用了两个，尔后又增至8个密钥轮，这使得破译密码更为复杂和费时。此时的图灵正研制英国“炸弹”机，它比波兰人的“炸弹”机更有效。英国“炸弹”机是货真价实的巨型计算机，它约含有33个由电力驱动的密钥轮，有时只需10分钟就能找到密钥轮正确的顺序。

图灵设计的第一台“炸弹”机于1940年投入使用。尔后，数学家戈登·韦尔什曼成功地对机器进行改进。1940年春天，德军远征挪威期间，布莱切利园已成功破译第一批密码。一年之后，英国人已能阅读“恩尼格玛”机发出的主要的无线电报。1941年末，布莱切利园庄园内已经有12台这样的机器运转。

恩尼格玛密码机并非一旦破解就一劳永逸，它是一个类别的加密体系，不仅密钥时时在变，系统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和修补，今天破解，不代表明天还能破解。所以，破译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功劳并不能全归功于图灵。实际上，当时的布莱切利园里四分之三是女性，有些部门的女性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1941年，德国阿勃韦尔情报局所使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被迪利·诺克斯部门的两位女性解密专家破译，这对之后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之前，破译这个版本的恩尼格玛被认为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布莱切利园文化

布莱切利园所在的政府密码学校直属军事情六处，本应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而园内却并非军事化，工作人员相对是自由的，没有军事的操练，也没有军队中士兵与长官间的礼仪，人与人之间在军事地位上是平等的，只是存在向上级汇报和请示工作的下属。与通常想象中情报机构森严的管理制度相反，园内轻松的环境甚至形成了独特的布莱切利园文化。园里有电影俱乐部，放映国内外的电影和纪录片；园内外不定期举办不同的音乐会，还有布莱切利园休闲俱乐部，布莱切利园的戏剧小组也经常演出戏剧、滑稽剧和哑剧。园里还有充满诗情画意的写诗人，亨利·里德创作的《部分之名》是其中最出色的诗歌之一，而包括阿萨·布里斯格在内的几位历史学家也在创作诗歌。他们认为“诗人创作的有关战争的诗歌远比历史学家对战争的记录重要”。

空军女子后备队成员格温·戴维斯在她的回忆录中，将布莱切利园描述成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精通书本、音乐、艺术、历史等的人士待在一起，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里绝对是一个文化繁盛的地方。”就是在这样一个包容、相对鼓励个性发展的环境内，各类才华横溢及有个性之人得以在这里相处共事——但同事间互相都不清楚对方正在进行怎样的破译工作。在1945年1月，即解密行动达到高峰期的时候，曾有约9000人在布莱切利园工作。这些获赠人士一般都具备有独特的才能，比如国际象棋冠军、填字游戏专家、精通数国语言的人或数学界权威。

如今，布莱切利园已成为一所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赵鲁整理)

科苑往事

坂田昌一(1911~1970)是日本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名古屋大学教授，尤以提出基本粒子的复合模型(又称坂田模型,1956)而闻名于世。五十年前，坂田在中国很有名，还因为他对于物质无限可分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63年，他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被译为中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不久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1964年8月18日和24日，毛主席分别找哲学工作者和物理学家谈坂田的文章。那时，坂田正率团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8月23日，毛主席会见各国科学家时，见到坂田对他谈读过你的文章。不久，坂田那篇文章又从日文重新翻译过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红旗》杂志还根据毛主席的两次讲话加了很长的按语，引发了中国科学界和哲学界的热烈讨论。

坂田昌一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实属偶然，却又有一定的必然性。坂田深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他的文章中还引用列宁的话，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位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物理学家。共同的思想基础引发思想上的共鸣，就绝非偶然了。

至于坂田与中国科学界的交往则更早。早在1955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坂田专程从任教的名古屋赴京都与郭沫若会面。次年，坂田随日本和平代表团访华期间，郭沫若曾设宴招待。1964年8月，坂田作为团长率60余人的日本科学代表团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郭沫若专门在四川饭店设宴款待他们，还当场为代表团的每个人写了一幅字赠送给他们。

有了以上的这些渊源，当1968年坂田昌一患多发性骨髓瘤，在日本国内医治没有明显效果之时，他想到了向中国求助。他委托1964年日本科学代表团顾问、名古屋大学校长山本孝给郭沫若写信求助。郭沫若随即请卫生部提供了一份中医处方。据说坂田服用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到了1970年初，坂田病情恶化，靠输血维持生命。他又委托山本教授再次向郭沫若求助。

1970年1月20日，收到有山的信后，郭沫若立即与中科院的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商量处理办法，刘西尧立即与卫生部军管主任邱国光同志联系，商请知名中医研究治疗处方。次日周恩来总理听取刘西尧的汇报后，立即批示同意按照刘西尧与郭沫若商量的办法处理。22日，卫生部提供了处方。郭沫若随即即将处方寄往日本。

但在处方的辗转抄写过程中，有两味药出了点问题，一是鸡血藤写成了鸡血笔，二是阿胶珠写成了阿胶珠。有山等人对此不明，又写信向郭沫若询问。2月中旬，郭沫若收到有山的信后，立即请秘书向卫生部查询，搞清楚事情原委。2月16日，郭沫若给有山复信说明情况。次日又请卫生部备好上述两药各三十剂，郭沫若随即委托日本友人转交给坂田。

3月20日，坂田昌一亲自写信给郭沫若表示感谢，信中说：“由于我及时地继续服用该药，所以我想不久会恢复健康的。实际上最近已经渐渐地能躺在床上坐起来，因而写信的事也就轻松地做到了。对于先生的帮忙，谨致以由衷的谢意。”3月30日，坂田又致信郭沫若说：“由于先生的帮助并托中国医学之福，我的病情已经全面好转，渐渐恢复了。但愿尽快恢复健康，有朝一日为中日学术交流多少作出点贡献。”

1970年5月中旬，山本孝致信郭沫若说，坂田病情好转，即将出院。但到了8月，坂田病情再度恶化。10月初，坂田致信郭沫若：“希望中日两国科学家携起手来，共同为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发展而尽力的日子早日到来。希望早日回到这条战线。”10月16日，坂田在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去世。有山随即写信给郭沫若报告了坂田去世的情况，信中说：“由于您的悉心所得到的中医处方，到十月十一日坠入意识不明之前日，一直都在认真服用。由于对中医之绝大信仰而生出的强烈的精神力量，加上长期服用所生出的罕见的持久的体力，看来在减轻疾病的痛苦上，发挥了很大的效果。患病时不用药，就在最后的阶段也是这样……坂田教授遗憾万分地去世了。但我相信，中日两国科学工作者诚心诚意的协作必将永远继续下去。”郭沫若还回应坂田夫人的请求，为坂田的墓碑题诗道：“科学与和平，创造日新月异。微观小宇宙，力转大车轮。坂田昌一先生千古。”

最后将治疗坂田昌一多发性骨髓瘤的处方抄录如下，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根据中医辩证分析，病在肝、脾、肾、督脉四经，治宜补肝肾，健脾胃，滋督脉，生骨髓，养气血。”

处方：西洋参三钱(先煎好，然后与下列药煎好的汤兑在一起服用)白术三钱 茯苓三钱 桔皮二钱 竹茹三钱 生薏仁五钱 砂仁二钱(砂仁后下)生黄耆五钱 当归三钱 杭芍三钱 生地三钱 鸡血藤五钱 阿胶珠三钱 杜仲三钱 川断三钱 龟甲三钱(要炒过的龟甲)龟板三钱(要炒过的龟板)山萸肉三钱 忍冬苈一两 桑寄生三钱

以上药剂水剂煎，文火煎半小时到一小时，煎成浓汁，每日一剂。

这个处方如果吃了以后很好，可以连续吃二三个月。病情如有变化，需另改处方。心情须保持恬静愉快，切忌操劳，加强对疾病斗争意志，忌服螃蟹，无鳞鱼及有刺激性食品。”

坂田昌一病危时的中药处方

■王扬宗